



ZhuanXingQi De PinKun “DaiJi ZhuanYi”Ji
XiangYing GongGong ZhengCe YanJiu

转型期的贫困“代际转移”及 相应公共政策研究

徐 慧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转型期的贫困“代际转移” 及相应公共政策研究

徐 慧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期的贫困“代际转移”及相应公共政策研究/

徐慧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41 - 6306 - 3

I. ①转… II. ①徐… III. ①家庭收入 - 研究 - 中国
②贫困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3951 号

责任编辑: 王长廷 刘 莎

责任校对: 王肖楠

责任印制: 邱 天

转型期的贫困“代际转移”及相应公共政策研究

徐 慧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厂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5 印张 230000 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306 - 3 定价: 6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在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显著的收入差距，使“效率”与“公平”成为我国改革以来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复制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对差距的关注从代内向代际发展，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作为衡量社会平等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代际研究的逐渐发展深刻地反映着潜在的社会问题，其中贫困的代际转移尤为如此。

作为收入差距与机会不公平的共同产物，贫困代际转移的发生源于差距并且恶化差距，与收入分配、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不平等的截面分布状况，是一种结构性的、静态的描述，也是一段时期社会流动形成的格局；社会流动则是社会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动态描述，是具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过程；贫困代际转移则是社会流动在代际间的一种状态，也是社会流动渠道不畅的一种现实反映。当一个社会中，父辈的资源拥有情况构成决定社会个体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那么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将会受到冲击，社会隔离或排斥机制会随之出现，导致社会阶层之间因缺乏流动而固化，也即容易出现贫富两极群体中社会成员生存状况的代际转移。

要了解我国贫困代际转移的实际情况，必须对我国贫困的发展和不同贫困群体的具体情况进行观察和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本书除了对总样本进行代际收入转换频率和代际收入弹性研究之外，还按不同分类标准形成了各组子样本，做了相应实证。基于通过调研获取的、调查对象近5年的平均收入数据，收入矩阵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父辈收入水

平降低，代际之间的结构流动率也呈下降趋势，表现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往下一代传递的社会特征，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最为封闭，存在较明显的代际相关。在父辈属于最低收入群体的子代中，有很高的比例（43.34%）仍然留在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组群的子代向上流动的趋势并不理想，父辈来自最低收入组的一部分子女的确上升到了最高收入组，但比例很小（7.82%）；最高收入组的父辈对子代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当然影响截然相反。在所有的分类研究中，包括按子代年龄分组研究、按父辈户籍分组研究、按父辈居住地的城乡差异分组研究、按父辈工作地的城乡差异分组研究、按地区（东、中、西）分组研究，父辈来自高收入组的子代留在最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几乎均大幅高于低收入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得到的弹性系数也与父子收入转换矩阵显示的情况相互印证。此外，通过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口的就业流出的确对农村代际转移的程度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客观地说，贫困代际转移的发生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必然，下一代是否会重复与父辈相似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复杂的影响机制。从父辈传递给子代的资本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和社会政治资本都十分典型，也往往是贫困群体比较缺乏的。从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来看，家庭因素（先赋性）、自身因素（自致性）因素总体上是内生因素，而制度性因素则是外生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的作用相互叠加、彼此放大，导致了贫困的代际转移，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消费、人力资本投资、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政治稳定和改革的推进、良性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成员的心态等都形成了不利的影响。但目前的公共政策和扶贫措施尚未有效地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在现行的政策中，有些政策对抑制贫困代际转移能起到间接的作用，例如扶贫政策对减少贫困家庭的规模，削弱贫困转移发生的基础都能产生积极作用；有的政策则更加直接和有效，例如公共教育和就业政策，能帮助贫困家庭的子代发展。但就总体效果而言，这些都不足以充分应对贫困发生代际转移的风险，需要政策向“上游”干预和“扶本”方向进行发展，从缓解经济贫困、提高子代的发展能力、保障子代的公平发展机会等几个角度同时切入，以更好地实现政策

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否定现行公共政策的作用，事实上，通过完善和整合现有政策，也可以强化其政策效果。因此，无论是推进现有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还是推进新政策的创建，对治理贫困代际转移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徐 慧

2015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章 贫困代际转移理论发展综述	1
第一节 国外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国内研究综述	13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18
第二章 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差距、社会流动与贫困代际转移	21
第一节 贫困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21
第二节 收入分配差距、社会流动与贫困代际转移	24
第三节 转型期我国贫困代际转移的发展	32
第三章 中国近期贫困代际转移的测度	43
第一节 调查设计和数据说明	43
第二节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47
第三节 代际转移的收入弹性测度	67
第四节 实证研究结论分析	74
第四章 转型期中国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82
第一节 代际间资本转移的主要内容	82
第二节 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87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实证	99

第五章 转型期中国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	107
第一节 贫困代际转移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107
第二节 贫困代际转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113
第三节 贫困代际转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18
第四节 贫困代际转移的其他影响	124
第六章 现有公共政策应对贫困代际转移分析	128
第一节 保障基本生存需要和抵御风险的公共政策	128
第二节 保障基本能力和基本健康需要的公共政策	151
第三节 现有公共政策的不足及代际困境述评	161
第七章 应对贫困代际转移的公共政策发展建议	167
第一节 公共政策应对贫困代际转移需要创新	167
第二节 公共政策应对贫困代际转移的设计原则	170
第三节 公共政策相应发展的理念更新和目标设定	174
第四节 相关公共政策的完善与发展建议	179
附录	203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3

第一章 贫困代际转移理论 发展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Fisher）曾说，“收入是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精辟描述了收入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位置。在这个久受关注的论题中，贫困的代际转移作为当代收入不平等向代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涉及收入问题研究领域，又涉及社会流动问题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贫困的代际发展问题被学术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定义和描述，例如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的代际转移、贫困的固化、贫困的循环、世袭贫困、贫困的延续、贫困的再生产等。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个在西方具有较大影响的贫困理论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逐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关注，使相关研究在不同的国家陆续受到重视，已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国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外研究者这一领域的规范研究的重点包括对传递内容、传递过程和传递方式（机制）等作出的全面分析，以下是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的领域。

（一）贫困代际转移问题的提出

贫困的代际相关性研究是代际收入流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代际收入流动研究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研究关注的是父辈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国外学术界关于贫困代际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的长期性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承现象”，基于该发现，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这个概念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因为在此之前，社会学家们已经展示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孩子的职业、教育及其他特征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在社会学相关的研究中，关于贫困代际转移的成果可追溯至1886年加尔顿（Galton）关于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限、收入对数等）代际回归分析，且社会学家尤其关注父子之间职业的流动性。1889年约翰·德威（John Dewey）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从平均趋势看，父母超过或低于均值的孩子，他们自己偏离均值仅仅是他们父母偏离的三分之一，像穷孩子更富和富孩子更穷的比率为2/3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① 社会学家这些研究展示了学术界对贫困代际转移现象的关注与成果。

随着贫困代际转移的发生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关注，经济学界也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使相关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现在，贫困代际转移的内涵已被十分清晰地界定为“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且同时继承这种传递性；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的一种恶性遗传链。”

（二）代际转移的内容研究

关于代际转移的内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多数集中在能通过家庭提供或获取的资源上，主张各类资本都能在家庭内部向下一代传递，并对提供

^① Dewey, John. Galton's Statistical Methods,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No. 17, 1889: 1331-3341.

者和获得者同时产生影响 (Moore, 2001), 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 (Boyden & Lingand Myers, 1998), 教育投资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 (Behnman, 1997), 教育一方面具有使得低收入成员获得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知识和资格, 以改善他们所处地位的作用; 另一方面, 教育具有复制原有生产关系的功能, 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获得的知识并不相同, 他们将回到父母原来的社会阶层中 (Carnoy & Levin, 1985); 社会资本 (包括社会文化资本和社会政治资本) 的转移影响地位获得及资源占有分配, 或致贫或为福利 (Coleman, 1999; Moore, 2001; Putnam, 2005), 对于无产权的阶层,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 子代获益越大; 物质资本 (Karen Moore, 2001) 和地位的代际继承的主要模式是生产资料 (土地、产权) 的继承, 等等。20 世纪, 一些贫民区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在研究贫民区的亚文化时, 美国学者刘易斯 (Osear Lewis, 1959) 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他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区居民进行一系列研究后认为, 当一群人几代都处于贫困状态的时候, 就会造成贫困者同主流社会的相对分隔, 从而产生一种适应这种贫困状况的贫困文化。贫困文化不仅会使贫困者保持贫困并且会成为一种在代际间传递的文化资产, 这使对通过代际转移产生影响的资本扩展到文化资本。

(三) 收入代际转移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规范研究后, 发现除了研究代际转移的表现外, 更重要的是分析代际转移背后的传递机制和发生的原因。波莱斯和吉蒂斯 (Bowles & Gintis, 2002) 认为, 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代际转移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否积极响应公共政策、是否使经济成就的获得更加公平等问题都是代际转移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对兄弟间相关关系的估计, 与代际收入弹性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子代收入的因素中, 父母收入水平只是其中一项, 而其他很多因素都与父母收入不相关。根据“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的专家凯伦·莫尔的研究, 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既复杂又相互影响, 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过程和社会生活方式, 以及人口迁移、社会法制及权利规范、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安全网

与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缺失与否等都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原因 (Moore, 2001)。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中,学术界对已有代际转移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有观点认为 (Bowles & Gintis, 2002),认知能力和教育已经被过度研究,而财富、种族及非认知行为特性的研究则不足。这些研究梳理工作的成果使理论界对代际转移机制的研究视角拓宽并逐渐深化。

(四) 职业代际流动研究

学术界认为职业与个体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的获得直接相关,因此,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作为一个评价社会机会与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Featherman, 1975; Ganzeboom, 1989; Erikson & Goldthorpe, 1992),同时也是社会发生代际转移的重要环节,获得了不少研究者的重视, [英] 金斯伯斯 (Ginsbers, 1929)、[英] 格拉斯 (Glass, 1954)、[英] 葛德斯普 (Goldthorpe, 1980)、[美] 布劳和杜尼恩 (Blau & Dunean, 1967)、[美] 菲瑟曼和豪瑟 (Featherman & Hauser, 1978) 均对本国的职业代际流动问题做过研究。在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及地位的代际传递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同通过教育与之有密切联系,能通过间接影响导致职业传递的观点,例如,布劳和杜尼恩 (P. Blau & D. Duncan) 于 1967 年发表的观点为,在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受教育水平,都对子代的职业地位的获得产生了显著的影响。^① 当子代具有同等教育水平时,家庭背景就会成为其初始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在 20 世纪中期学术界对各国的职业代际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中,不少结论均支持这一观点。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父亲职业为较高层次的管理类别时,其儿子近 2/3 也从事管理工作;父亲从事体力劳动的,其儿子多数亦然 (Benjamin, 1958)。在美国,职业代际效应也很明显,且子承父业的比例较高 (Blau & Duncan, 1957)。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作用模式的确是存在差异的。

^① P. Blau &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五）代际转移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通过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判断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公平状况，对它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该方向的现有研究中，学术界主要是想通过度量家庭对孩子财富（福利）的影响，进而通过了解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机会平等与经济正义的关系。贝克和汤姆斯（Becker & Tomes）在《收入分配与代际转移的均衡理论》（1979）中指出，收入分配的全面分析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相同家庭不同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即通常被称作代际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是同代中不同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代际流动），即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的研究，可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即不同代的家庭的收入决定理论。贝克和汤姆斯（1979，1986）的研究首次建立了经济学模型解释代际收入的相关问题，其经典研究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① 贝克和汤姆斯假设每个家庭在跨代际间最大化其效用，进而提出了不平等与代际转移的理论，在1986年发表的成果中，其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平等能够产生于最大化行为，而不是主要依靠运气和其他随机力量，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家庭的一个部分，当遗传程度和投资倾向越来越大的时候，家庭的重要性就越明显。总的来说，即代际流动、家庭兴衰与不平等机会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统一的整体，“孩子的成就相对于父母来说趋向或偏离均值的回归程度是一种对社会中机会平等程度的测度”。泽默尔曼（Zimmerman，1992）认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承继”了父母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平等机会和经济正义的争论基础”。^②

（六）公共政策调节代际转移的研究

在贫困代际转移的应对措施研究中，公共政策是研究的核心领域之

① Gary S. Becker & Nigel Tomes.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 (6): 1153 - 1189.

② D. Zimmerman.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3): 409 - 429.

一。马克·罗伯特·兰克 (Mark Robert Rank, 2003) 提出观点认为, 贫困根源于制度, 需考虑更广泛的制度层面的解决措施。发展中国家应消除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资本在代际传递角度上的差距, 社会政策应消除歧视, 确保弱势群体有权获得资源、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机会, 对最可能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群体, 应尽可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健康服务 (包括营养) 和有效的社会保障 (Moore, 2001)。通过对公共消费进行重新配置, 保证贫困者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通过研究, 学术界还发现社会保障和代际转移模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Junsen Zhang, 1998) 等。

二、国外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 代际收入转移的模型

国外研究者基于模型研究, 对收入的代际转移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实证工作。贝克和汤姆斯“效用最大化的家庭行为”模型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 贝克和汤姆斯 (1986) 认为从理论到实证系统思考代际流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而熊彼特 (Schumpeter, 1951) 是仅有的做到了这一点的主要经济学家。在前辈经济学家和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 他们从经济理论出发开始对收入代际转移问题进行了模型化分析。^① 此外, 人力资本模型、分位回归模型也是国外收入代际转移问题研究的理论模型之一, 其他诸如交换模型、自我中心主义模型及非预期的遗产模型等都对收入的代际转移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解释力。

(二) 收入弹性的实证结论

对于学术界来说, 代际收入弹性是研究不平等在代际间转移情况最基础的一步, 也是研究的最多的一个方面, 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代际收入弹性变动的趋势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早期关于父母

^① Gary S. Becker & Nigel Tom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 (3): 1-39.

和成年后孩子间的经济地位的统计关系,美国的研究是较为丰富的,比赫尔曼和塔乌曼 (Behrman & Taubman, 1985) 估计了美国对数收入的父子代际相关系数为 0.2 或更小,结论是“样本成员来自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但由于该研究是基于单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因此研究结论与所谓社会底层代际化的实际情况产生了矛盾,索洛 (Gary Solon, 1989, 1992, 1999) 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因为测量误差、同质性样本及两者的互动,这种代际相关性被大大低估,”而“导致这些结论的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单年收入测量,在很多情况下,衰减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被对特殊的同质性样本的依赖所强化。”理论界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采用单年收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导致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估值的低估后,开始使用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并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掀起了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一股新高潮,美国在代际数据 PSID 基础上的新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由 0.2 上升至 0.4 (Solon & Zimmerman, 1992),甚至上升到美国早期研究均值的三倍 (Bowles & Gintis, 2002)。

进入 21 世纪后,对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数据结论,例如,英国在 0.6 左右 (Grawe, 2004);而北欧的发达国家芬兰、瑞典、挪威则大概为 0.2。不过尼尔森、威治和雅各布森 (Fivind Anti Nilsen, Kjell Vaage & Karl Age Jacobsen, 2008) 将父亲 30 年的收入数据处理后,对挪威的代际收入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则显示出与之不同的、很高的代际收入弹性。事实上,早在 2002 年,索洛就已通过对比各国已有的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结论,发现大部分有关美国 and 英国收入代际流动状况研究所计算出的代际弹性系数均在 0.4 以上,而大部分有关北欧国家和加拿大收入代际流动状况研究所计算出的代际弹性系数均在 0.3 以下。

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起步要晚一点,但代际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结论。例如,1995 年,李拉德和基尔伯恩 (Lillard & Kilburn) 对马来西亚收入代际弹性进行了研究 (约为 0.26),这已是对发达国家以外的研究中较早的一个案例了。此后,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些以非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赫兹 (Hertz, 2001) 对南非的

代际收入流动弹性系数的研究得出的估值是 0.609；杜恩（Dunn，2007）采用双变量工具变量法，得出巴西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是 0.69，而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出的数值为 0.53。

在各国关于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后，一些学者们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各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对比，国际比较研究随之逐渐兴起。学术界认为，对于经济地位由父辈向下一代传递的程度进行跨国比较，即代际流动的跨国差异研究是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达国家内部代际流动差异的比较，例如里克森和葛德斯普（Rikson & Goldthorpe，1991）采用 15 个国家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等往往倾向于和更高的社会流动相关。布乔克鲁德和詹蒂（Anders Bjorklund & Markus Jantti，1997）的研究认为，瑞典有着更小的收入不平等和更大的代际流动，而美国则有着更大收入差距和更小的收入代际流动，这提出了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否彼此独立的问题。索洛（2002）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国际间代际收入流动的差异。尼格、霍和沈（Ng，Ho & Shen，2008）比较了新加坡和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其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基本上相同，美国的是 0.47，新加坡的是 0.45。格拉温（Grawe，2001，2004）对厄瓜多尔、尼泊尔、巴基斯坦和秘鲁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均对收入代际流动的国际比较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性的数据。

（三）计量偏误修正研究

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不断发现问题，在进行计量偏误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了样本的选取、处理和模型等研究方法。

1. 同质性样本引起的计量偏误研究

在代际收入弹性计量研究的初级阶段，其研究成果由于各种原因与实际情况不够吻合，学术对此进行了分析。1992 年前，关于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偏误，主要是弹性估计值偏低。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思考，提出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大多为同质性样本是导致这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较早关注代际收入流动的经济学家索尔托（Soltow，

1965)、豪瑟 (Sewell and Hauser, 1975)、比赫曼和塔乌曼 (Behrman & Taubman, 1985) 的研究中, 样本的选取集中于某一地理区域, 或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 其样本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随机抽样的假设, 导致了相关系数的失真, 使结果不具有推广性和普遍性。这一情况促使了学术界从数据样本和计量方法两个方面对研究进行了改良。

2. 短期性收入样本引起的计量偏误的研究

数据样本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是收入代际转移研究的基础, 也是最容易引起计量偏误的环节之一, 即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 如何选取父辈和子代可观测收入作为数据样本十分重要。索洛在阐明已有研究的局限性时 (Inter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 提出, 代际收入弹性估值在既往研究中出现了向下的偏误, 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来自同质性样本带来的不利影响, 将短期收入数据作为研究基础, 也同样会带来类似的问题。由于很难获得长期收入数据的有效信息, 研究中的收入数据样本通常使用短时期收入 (通常是单年收入代理持久收入)。这一情况被关注后, 如何合理地估计生命周期内的持久收入也成为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一方面使用多年收入的平均值来校正, 另一方面不断引入工具变量, 如引入父亲受教育的年限、邓肯量表 (Duncan Index) 中的社会地位等作为工具变量, 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得到了很大的修正。例如, 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代际传递机制的大量实证研究。埃德和舒瓦尔特 (Eide & Showalter, 1999) 把教育年限纳入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应用分位数回归估计模型后, 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降低了 50%, 研究结论表明教育可以解释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里斯图西亚和尤鲁蒂亚 (Restuccia & Urutia, 2004)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近来, 也有学者提出在这个问题上, 关于教育的影响已经被研究得过多, 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不够或有所忽视。同时, 学术界还发现, 如果引入的工具变量不理想的话, 极有可能导致弹性系数出现向上的偏误。有学者提出, 根据当前已有研究成果, 真实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应是介于这两种方法所估计的系数之间的。

从国外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 相关研究成果总体很丰富, 也比较全面和系统, 但客观地说, 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各种偏误。